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革命史”的寫法：從《紅日》到《晚霞消失的時候》

叢新強

摘要：在“革命史”寫作的意義上，從《紅日》到《晚霞消失的時候》既有外在的史料承接性，也有內在的精神連貫性。前者作為五十年代戰爭文學的代表作，全景展示“革命歷史小說”的主體特徵；後者作為新時期文學發生期的爭議性文本，側面揭示不同於此前的另一種革命歷史形態。相對於前者的勝利者立場的史述，後者的失敗者立場更加強化了史述的真實性。其中關於“革命史”的不同寫法，既是對前者“革命歷史主義”的超越，也為後續“新歷史主義”的發生提供了過渡，顯示出某種可能的文學史線索。

關鍵詞：《紅日》；《晚霞消失的時候》；“革命史”寫作

Abstract: In the sense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writing, from *Red Sun* to *When the Afterglow Fades*, there is not only an external connection in historical materials but also an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spirit. The former,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inese War Literature in the 1950s, comprehensively showca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s”; the latter, as a controversial text during the nascent period of the “New Era Literature”, reveals from the side a different for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from the previous ones. Compared with the former’s historical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ctor, the latter’s narr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ser further enhance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writing “Revolutionary History” in these two works not only transcend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icism” but also provide a transi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ism”, revealing a possible literary historical thread.

Keywords: *Red Sun*; *When the Afterglow Fades*; “Revolutionary History” writing

文學史家程光燁在《為什麼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說》中指出，“小說也是一種史料”¹。他進一步以禮平的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²為例，通過遭受“紅衛

¹ 程光燁：《為什麼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說》，《文藝爭鳴》2011年第12期。

² 原載《十月》1981年第1期，收入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之同名本《晚霞消失的時候》，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以下簡稱《晚霞》。

兵”批判的楚軒吾教導即將插隊邊疆的外孫女南珊“我雖願你心中有理，卻不願你心中無情”，並以此去原諒傷害者的一番囑託，說明這個論斷的重要意義。“老人在公理蕩然無存的緊要時刻，卻告知外孫女要站在歷史高度原諒並超越這一切，對人和人間懷著‘赤子之心’，這樣的小說描寫所具有的史料價值，恐怕是史無前例的吧。它警示人們，即使在前所未有的黑暗的年代，也有人在默默地堅守道德的底線。”¹不能不說，《晚霞》的確內在地具有這樣的特徵。當“歷史書寫”不能夠或者不便於表現“歷史發生”的時候，“小說創作”就提供了充當“歷史書寫”的可能性，就具有了歷史“史料”的意味，“歷史的記憶”也就留存在“小說的深處”。在這個意義上，《晚霞》的第二章“夏”完全可以獨立地作為某種“革命史”的寫法來加以闡釋。如果以此為基礎回溯至建國後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尤其是與所謂“紅色經典”中的《紅日》進行對照的話，不難發現從《紅日》到《晚霞》中所存在的獨特的文學史線索。

一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中，吳強的《紅日》被概括為“把真實的戰爭事件（四十年代內戰時的漣水、萊蕪、孟良崮戰役）、人物（國民黨軍將領張靈甫）與藝術虛構加以結合”的作品。“故事的展開方式和人物活動的具體描寫，主旨在於對‘正義之師’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回答勝利取得的根據——這也是大多數‘革命歷史小說’所要達到的目的。”²顯然，《紅日》具有其歷史“真實性”的一面，也有其創作“類型化”的一面，更有其價值“重要性”的一面，在“小說也是一種史料”這個意義上完全可以作為代表性文本。

《紅日》是以戰爭佈局作為核心線索，整體充斥著那種特別想戰鬥的激情氛圍，瀰漫著立即投入戰鬥的急切情緒。與此同時，還充分揭示出戰爭環境下的愛情、婚姻、家庭關係及其對應人物為代表的民間倫理意識，也有敵我雙方戰鬥場景和勝負的具體描繪及其民心向背的基礎反映。除此之外，更為突出的價值集中落腳於敵我最後決戰中的心態變化及其成敗走向。因為解放軍的目標是消滅國民黨王牌軍七十四師，此前的戰鬥祇是鋪墊；而七十四師的目標則是堅守孟良崮，徹底消滅解放軍的有生力量。所以，七十四師的命運軌跡纔是真

¹ 程光燁：《為什麼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說》，《文藝爭鳴》2011年第12期。

²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頁。

正的焦點所在，其實也是《紅日》這部小說的終極表現。既然如此，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參謀長董耀宗自然成為其中的核心人物。而在表現這兩個人物的過程中，又穿插一個介入二者之間的中間人物張小甫。

《紅日》中的七十四師是蔣介石的特等精銳部隊和“天之驕子”，師長張靈甫是蔣介石的心腹大員和“常勝將軍”。“他的身材魁梧，生一副大長方臉，嘴巴闊大，肌膚呈著紫檀色。因為沒有蓄髮，腦袋顯得特別大，眼珠發著綠裏帶黃的顏色，放射著使他的部屬不寒而慄的凶光。從他的全身、全相綜合起來看，使人覺得他有些蠢笨而又陰險可怕，是一個國民黨軍隊有氣派的典型軍官。”¹不管真實的張靈甫形象如何，這裏顯然屬於勝利者立場的書寫。在與參謀長董耀宗的談話中，更加顯示出張靈甫的戰略眼光和戰術判斷。“胡宗南拿了個延安，那有什麼味道？空城一座！戰爭，最重要的是消滅敵人的實力！我們跟共產黨打了二十年，不明智之處，就是得城得地的觀念太重，不注意撲滅敵人的力量。共產黨的戰法是實力戰，我們也要以實力對付實力，以強大的實力撲滅他們弱小的實力。”²不能不承認，這裏抓住了雙方的根本問題，所以“師長的氣色、風度，就是七十四師的靈魂，就是天下無敵的標誌。”³就是這樣一位不可謂不卓越的軍事將領，卻淪落到徹底失敗的境地以至於命喪孟良崮，原因何在？儘管有其自身性格使然，也更有其根本無法掌控的國民黨軍隊的整體狀態所決定。如董耀宗糾正其錯誤時說的那樣，“萊蕪一戰，李仙洲被圍，我們中央系統的部隊，也有我們七十四師在內，要保全自己，救援不力，使他們陷於毀滅。這番，我們被圍，他們桂系的七師、四十八師，會為了救援我們拼死賣命？”⁴他進一步點明決定戰局發展的終極因素，那就是“停止彼此勾心鬥角、互相傾軋、各懷鬼胎的局面！共產黨內部一心一德，我們是離心離德，爾虞我詐！”⁵從事後來看，這也符合歷史的實際。

相對於張靈甫的驕悍自信和堅持到底，董耀宗則洞察時勢和尋找出路。他認為人總應該活著，任何時候都應該避免死去，也就為後續的被俘結局做好了準備。他同樣異常準確地分析戰局，“我們這個師，以孟良崮為核心，拉住了敵

¹ 吳強：《紅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85—386頁。

² 吳強：《紅日》，第387—388頁。

³ 吳強：《紅日》，第389—390頁。

⁴ 吳強：《紅日》，第477頁。

⁵ 吳強：《紅日》，第478頁。

人的手腳，敵人在我們的四周，敵人的週邊又是我們的友軍，形勢是非常非常好的。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的友軍，不在我們。”¹而恰恰就是友軍之間“離心離德，爾虞我詐”，致使戰局不可逆轉。既然如此，董耀宗對於張靈甫的勸諫也就自然而然甚至完全可以理解。“不是為了輔佐你，我不會在這個時代從事戎馬生涯！我已經年近知命，甫公！人生的真諦是活，不是別的，不是死！這是最危險的時候，是死到臨頭的時候，我冒膽地對你說了這幾句話。也許你不以為然，但我是出之肺腑。你用手槍打死我也未嘗不可，我的心，真是忠於你的。我家小，你有妻室兒女，我們不能叫他們悲痛終生！你知道，我不是貪生的人，我知道，你也不是怕死者，但是，我們不應該枉作犧牲！”²這是內心的坦陳，也是最後的機會。事已至此，所謂的犧牲已經沒有任何意義。

在張靈甫和董耀宗之間，還有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具有反戰精神的營長張小甫。被解放軍俘虜後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更加強化了他的反內戰意識。“我認為內戰不應該再打下去。八年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現在，又打內戰！為內戰犧牲人命，百姓受苦。我沒有死，為打內戰而死，不值得。……我擔心師長，擔心七十四師兩萬多人！……眼前這一仗，不知又是什麼結果！路上，山溝裏，麥田裏，盡是死屍，有的受了傷沒人問，倒在山溝裏。戰爭！我害怕！厭惡！這樣的戰爭有什麼意義！對民族有什麼好處！我沒有別的話說，師長的前途，七十四師的前途，請師長想想，考慮考慮！”³作為五十年代戰爭文學的《紅日》，尚具有如此鮮明的戰爭反思乃至明確的反戰思想，實屬難能可貴。文學總是有其超越性，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既有規定中，有意無意地揭示並保存了歷史存在的另一面真相。

吳強曾經說過，“從史實和生活經驗出發，對敵人張靈甫之類，必須真實地表現他們，暴露他們，無情的鞭撻他們。他們是人，是活人，他們有他們的反動的共性，也有他們各自的性格和生活趣味。我警惕著自己：寫敵人，切忌寫死了，寫假了。寫死了，使活的敵人等於僵屍，以僵屍為敵，我們算得什麼強手。寫假了，不可信，引不起人們的憎恨。”⁴《紅日》是較為典型的“革命歷史小說”的寫法，從上述情節和三個人物的分析中很容易聯想起《晚霞》中的那段

¹ 吳強：《紅日》，第 388 頁。

² 吳強：《紅日》，第 480 頁。

³ 吳強：《紅日》，第 409 頁。

⁴ 吳強：《寫作〈紅日〉的情況和一些體會》，《人民文學》1960 年第 1 期。

相近的“革命史”和相關的一個人物黃伯韜、楚軒吾、楚定飛以及襯托輝映的人物李聚興。

二

禮平的中篇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曾經一度被當作“文革”後期的“手抄本”，後來又被證明這種說法“子虛烏有”，屬於以訛傳訛。¹顯然，《晚霞》的價值並非在於“手抄本”與否，而在於文本本身。不用說在其產生的年代反響熱烈，就是在今天看來依然彌足珍貴。

《晚霞》以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的情感歷程為主線，分為“春”“夏”“冬”“秋”四個篇章次第展開。在“春”的環節，男女主人公因為讀書而相遇，引發出“文明與野蠻永遠分不開”這樣一個囊括全部人類歷史的大題目，彼此留下美好的印象；在“夏”的環節，男女主人公因為紅衛兵運動而處於抄家和被抄家、審訊和被審訊的境地，引發出解放戰爭的歷史側面及其當事人的命運變遷，彼此的茫然失望和內心傷害隨即而來；在“冬”的環節，男女主人公因為上山下鄉運動而共時於送別的場景，引發出祖孫兩代的心靈軌跡和赤子之心，為男主人公的反省、懺悔和女主人公的寬恕、信仰做好了鋪墊；在“秋”的環節，男女主人公因為各自的新生而奇遇和重逢，引發出科學、哲學、宗教之間的思辨以及感性與理性、愛情與人生的對話思考，重新回歸春天提出的關於文明和野蠻關係的話題。本是收穫的季節卻是感情的失落，告別往事也就預示著開始未來。顯然，《晚霞》問題敏感、內涵豐富、價值多元，產生不同的爭論甚至相關的批判也在情理之中。這裏主要以第二章“夏”為例，展開前述所謂的“革命史”寫作的討論，儘管不一定是小說的主旨，但以其相對獨立性而言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完整的小說篇章來對待。

《晚霞》第二章“夏”表面是對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的書寫，實際卻是五六十年代革命歷史題材的範圍。文本通過紅衛兵李淮平抄家審訊國民黨投誠軍長楚軒吾的方式，以要求後者如實交代歷史問題的名義，細緻描述解放戰爭的

¹ 洪子誠：《〈晚霞消失的時候〉：歷史反思的文學方式》，《文藝爭鳴》2016年第3期。

場景和側面，尤其是戰爭環境下的人的命運起伏。無論歷史事件還是人物形象，與前述《紅日》的“革命史”寫作均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晚霞》中，楚軒吾的身份是國民黨國防部高級專員，後兼任國民黨第二十五軍代理軍長。其父楚元系軍閥馮玉祥舊部，在抗戰時陣亡；其子楚定飛是國民黨下級軍官，因勸諫兵團司令停戰而被軍法處死；其本人在 1948 年淮海戰役中主動投誠。作為國防部高級專員，楚軒吾的使命是傳達蔣介石的戰略意圖和作戰方針並視察前線防務。為挽救困局，他主動請求並臨危兼任代理軍長。“戰鬥的發展在開闊的淮海大平原上是極其猛烈的。我在二次直奉戰爭中參加過長辛店大戰，在抗戰中參加過棗莊大會戰，可從來沒見過像這次這樣排山倒海的攻勢。解放軍的衝鋒常常擺開一個極大的扇面，像一陣潮水般地湧上來淹沒了我們的層層陣地。”¹最後的結果是，司令部掩蔽所也暴露在解放軍的機槍射程之內。“這次大戰從一開始，雙方就投入了幾十個軍的兵力，而我們在這鐵錘和鐵砧的撞擊之中正首當其衝。這種戰爭的規模是我們從未經歷過的。現在，在幾千平方米的陣地之內，每一個倉促掘成的戰壕和彈坑中都擠滿了人和死屍。每一顆炮彈下來，都會飛起一片殘肢斷臂。在這樣的戰場上，除了死和降，再也沒有其他出路了。”²很明顯，這樣的場景和結局，也幾乎是《紅日》的翻版，儘管出自戰敗者名義的講述。面對軍團司令黃伯韜的絕望自殺，面對彈痕營長的冒死進言，面對全部戰場的悲慘死亡，面對交戰雙方的瘋狂對射，楚軒吾率領最後的一千多倖存者向解放軍投降。《紅日》中的勝利者立場和《晚霞》中的失敗者立場，共同講述了“革命史”的相似面貌。

《晚霞》中的黃伯韜是第七兵團司令，雖非黃埔系但深受蔣介石的重用，亦可見其作戰能力。危難之際，他不願意楚軒吾陪同自己同歸於盡，而勸說他們一行離開戰場；他明知殘局已定，仍然保持鎮靜。“這個身經百戰的反共宿將，每天用上萬人的傷亡做代價，沉著地逼著士兵們死守每一寸陣地，等待著援軍。他知道，這塊戰場上的進退得失，不但關係著他一個人的命運，而且關係著黨國的命運。”³當楚定飛前來冒死勸降之時，黃伯韜依然頑抗到底，按照“臨陣畏縮者殺無赦”而對“陣前請降者”、“動搖軍心者”堅決執行；當對楚定飛

¹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82 頁。

²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83 頁。

³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82—183 頁。

軍法從事之後，黃伯韜的反應是兩眼發直，神情呆滯，抱頭大哭：“該死啊，該死！……我從小把他看大，掌上膝下，何等疼愛！想不到……”¹可見其並非無情無義之流，而實在是戰爭慘烈之寫照，也暗示其“殺身成仁”之決心。他的開槍自殺，或可認為不識時務，其實不識時務者或許更為俊傑。就像《紅日》中的張靈甫一樣，不管其自身如何，都難以扭轉整體戰局。就像張靈甫的部隊孤軍堅守而缺乏增援一樣，黃伯韜的部隊也是孤軍深入而增援不力。不同類型的文本史述中，指向的卻是相同狀態的歷史情境。

如《紅日》中的張小甫，《晚霞》中的楚定飛也是在戰爭中萌生反戰意識，進而以死勸諫。他不顧一切地撞在黃伯韜腳下，“司令！仗打到這種地步，不能再叫弟兄們白白送死了！總統無能，不該叫士兵們喪命！黃司令！黃公！幾千條性命在你手裏，不能再抵抗了！我們投降吧！投降吧！”²當勸諫無效而臨死之時，他明確表達的是，“我勸降不是自己畏死，而是認為叫倖存的士兵徒死無益！”³“既然不容於軍法，惟求一死而已”“望你們以士兵為念。”³其實也正是有了這種自覺，纔促使楚軒吾最終走向投誠之路。儘管與張小甫的結局不同，但內在的精神卻一致。

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發展的當口，禮平的《晚霞》將表現的層面聚焦於歷史還原和人生哲理。以李淮平為代表的紅衛兵們的革命理論及其行動，獲得的卻是生活的廢墟、愛情的廢墟和文化的廢墟。其中的“革命史”寫作不僅與此不矛盾，反而恰恰提供了不同革命形態之間的相互對照，並在無意中相對獨立地接續了“革命歷史小說”的文學史敘述。

三

其實真正的問題往往發生在革命和戰爭的“第二天”，而在“當天”所關注的往往是勝利或者失敗，但更為關鍵的是勝利或者失敗之後的狀況怎樣？《晚霞》的主旨顯然在追究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運動之後，到底給個人和民族帶來了什麼，並且如何纔能獲得新生的力量。但這並不妨礙從“革命史”寫作的角

¹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186頁。

²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184頁。

³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185—186頁。

度來獨立探討戰爭之後的問題，也就是楚軒吾率部投誠之後，所謂的“敵我”雙方又是怎樣去互相面對。

按照歷史當事人的“交代”，戰敗受降的楚軒吾被華東野戰軍第五縱隊的參謀長李聚興負責接收工作。在楚軒吾印象中，李聚興令人難忘。“我永遠都記得這個道德極高而又修養極深的人。”“我與共產黨作戰二十餘年，他卻是我見到的第一個共產黨人。我至今認為，他是我對共產主義發生認識的啟蒙者，他對我後半生道路的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因而儘管我已經十八年沒有再見到他了，但他的人格我永遠難忘。”¹正是因為戰爭之後的關係處理，共產黨在國民黨心目中的固化形象得以改觀，那種妖魔化對方的策略和管道難以為繼。除此之外，所謂的敵我雙方還共同巡視整個戰場，並就各自的優勢和劣勢進行開誠佈公的交談。“我方”詢問“敵方”的防禦意圖和兵力部署，當看到被完全摧毀的炮兵陣地時，李聚興進行了嚴厲批評：“你們在這樣近距離作戰中使用炮兵盲目射擊，完全是一種無效的戰術動作。……結果你們的炮兵不但沒有摧毀我方任何重要的目標，而且成了你們防守的沉重負擔。”²在戰事之後，還能客觀指出對手的失誤，而非居高臨下、居功自傲，實屬難得；而看到敵方在戰鬥中倉促構築的工事系統時卻又讚不絕口，因為正是這樣的工事佈局和火力配備纔使得“我方”的穿插手段在整個攻擊中始終未能奏效。敵我雙方的敞開交談，徹底改變了“敵方”眼中的“我方”形象，“我馬上就在這個農民出身的將軍身上看到了非常出色的軍事才能。我真想不到一向以騷擾和奔襲為主要作戰手段的共產黨遊擊戰中，竟能造就這樣通曉正規教範的人材。共產黨軍事指揮員給我的這第一個印象，就與國民黨那些勝則爭功、敗則諉過的將領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³如此的側面反映和溢美之詞，實則暗含著敵我雙方的歷史真相。當歷史教科書無法表現某些歷史內容的時候，文學卻以其獨特的修辭手段保存了這些內容並將其揭示出來，從而具有了成為“史料”的可能性。。

更進一步，在戰俘準備解送後方的餞行儀式上，出於職業的共同興趣，戰爭雙方竟然把簡樸的宴會變成了老相識們的軍事討論會。不僅做了更加詳盡的戰事分析，而且深刻總結了雙方勝敗的根源，並從民族大義的立場為內戰性質

¹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89 頁。

²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91 頁。

³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91 頁。

進行定位。尤其重要的是，雙方似乎已經找到出路並達成共識，“希望你們能在民主陣營中找到真正的出路，並終於跟上歷史的潮流。我相信，凡是有愛國心的人都能做到這一點。來，為國家更新，為諸位新生，乾杯！”¹“國家更新”和“諸位新生”的目標，就這樣自然地獲得有效結合。在李聚興這裏，“軍情如火”和“人情如水”不能攪合。他巧妙借機兒子的出生，戰爭雙方的共同理想得以鮮明表達。楚軒吾的祝願是“我們的子孫永不征戰”，李聚興的祝願除了“天下赤子永不廝殺”之外，“但假如四海未平，一旦國家有警，我卻願為我們的子孫共同征戰而連盡三杯！”²“永不征戰”或者“共同征戰”，也就再也沒有民族內戰，無疑構成歷史的真正改觀。

《晚霞》以“我”正義“審訊”歷史當事人、歷史當事人坦白“交代”的方式切入那一段好像人所共知的歷史，卻不經意間提供了一段仿佛不為人知的歷史。這種“審訊”和“交代”的關係，無疑強化了相關歷史的真實性。“我”不僅重新認識了父親代表的“我方”，更重新認識了楚軒吾代表的“敵方”，敵我雙方的內在精神在“我”這裏達到了高度一致。即便後續對於南珊姐弟的另外審訊，其實已經無關緊要，不過是為懺悔的發生增加重力。及至第三章“冬”中的送別場景，無非進一步強化祖孫兩代的人性美德和全部人格，並引伸出政治道路和國家命運的選擇。而這一切的終極，都存在於人類心靈中，“決不能因為自己信奉了什麼就投身到將某種意志強加於人的鬥爭中去。”³這是歷史的教訓，也是人性的隱喻。

《晚霞》中的楚軒吾，被塑造為一個深刻的矛盾體。其“淳厚正直的個人品質”和“罪孽深重的政治歷史”的尖銳對立⁴，從最初的無法調和到後來的界限模糊再到最終的消弭殆盡。這樣的發展過程，不僅深刻揭示著人在歷史中的命運選擇，也同步表徵著對既有“革命史”的本質超越。當父親得知抄家事件發生後，不僅仍然稱呼的是“楚軍長”，而且更為痛心的是“沒有臉面再去見這個人”，因為雙方的談話已經“建立了一種老朋友似的關係”，從歷史總結出來的“卻並不是仇恨”，因為“他早就不是我們革命的對象了”。⁵接受投誠者並沒有兌

¹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93 頁。

²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195 頁。

³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220 頁。

⁴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221 頁。

⁵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選編：《晚霞消失的時候》，第 222—224 頁。

現並保障對投誠者的承諾，儘管歷史已經再次變化，但人性的倫理底線仍然需要堅守。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總是關注於革命的“當天”而裹足不前，結局的勝利或者失敗是其關心的焦點，儘管最終走向了勝利，以《紅日》為代表的“紅色經典”文本即是明證，也可以將其視為勝利者立場的史述；而《晚霞》中的“革命史”講述則開始關注於革命的“第二天”¹，結局的勝利或者失敗已經不重要，儘管最終走向了勝利，但其焦點則轉移至勝利之後怎樣繼續和繼續如何的反映與表現，也可以將其相對視為失敗者立場的史述。從《紅日》到《晚霞》的“革命史”寫作，既有其外在的史料承接性，也有其內在的精神連貫性。其中關於“革命史”的不同寫法，既是對前者“革命歷史主義”的超越，也為後續“新歷史主義”的發生提供了過渡，顯示出某種可能的文學史線索。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¹ [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2 年版，第 75 頁。